

刘敦桢《文津阁四库本〈营造法式〉校勘记》^①

A Collation Note of *Yingzao Fashi* by LIU Dunzhen Based on the Edition of *Siku Quanshu* of *Wenjing*

丁焱 | DING Yao 李晓 | Li Xiao 杨朝 | YANG Zhao

中图分类号: TU-092.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2) 05-0033-06 DOI: 10.12285/jzs.20221020002

摘要: 中国营造学社留下的一部“石印本”《营造法式》，1939年天津洪水后由朱启钤带领抢救重裱，幸运保存至今。这部书扉页有刘敦桢1933年4月主持用“文津阁四库本”校勘时写的题记，是学社整理、研究《营造法式》的一篇重要文献，体现出当时学社和刘敦桢个人《营造法式》研究的特点和成绩。同时，这篇题记对澄清学社这段时期的人事、历史也很有价值。

关键词: 刘敦桢、《营造法式》、文津阁《四库全书》、校勘、中国营造学社

Abstract: Thanks to Zhu Qiqian's rescue and remounting, a set of book of *Yingzao Fashi* published in 1919, with a manuscript of note in April 1933 written by Liu Dunzhen upon the flyleaf, survived the war and flood in 1930s to 1940s. The note was for a collating work, that summed up the features of the edition of *Siku Quanshu* of *Wenjing*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editions, by Liu Dunzhen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SRCA). The methods and viewpoints of SRCA's research on *Yingzao Fashi* could be proved in Liu Dunzhen's manuscript. Meanwhile, this note is also meaningful for clarifying some facts during the history of the SRCA.

Keywords: LIU Dunzhen, *Yingzao Fashi*, *Siku Quanshu* of *Wenjing* Edition, collation,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在近年中国营造学社九十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我们曾介绍过一部《营造法式》（后简称《法式》）“石印本”，是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用本^②（图1），扉页有刘士能（敦桢）先生1933年4月手书题记（后简称《记》），内容是以“文津阁四库本”校勘《法式》的总结。（图2）

当时，刘公方主学社文献组^③，与同仁以新见之“故宫本”^④及移藏燕京之文津阁本^⑤详勘《法式》甫竣^⑥。前者之校记，有刘叙杰先生编纂刘公《文集》、《全集》以及傅熹年先生“合校本”之刊布^⑦，已为学界所共知（图3）。后者即此《记》，则随所附《法式》一书辗转颠沛，先避战火、再逢洪水^⑧，又长期深藏书库^⑨，鲜有知者。故再

作者:

丁焱，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晓，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
究生；
杨朝，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辽代
建筑系列研究（三）”（51278328）



图1: 中国营造学社考订稿本《法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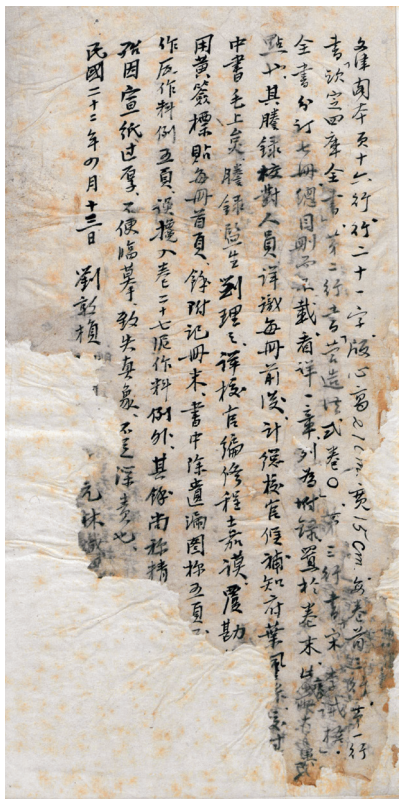


图2: 刘敦桢《文津阁四库本〈营造法式〉校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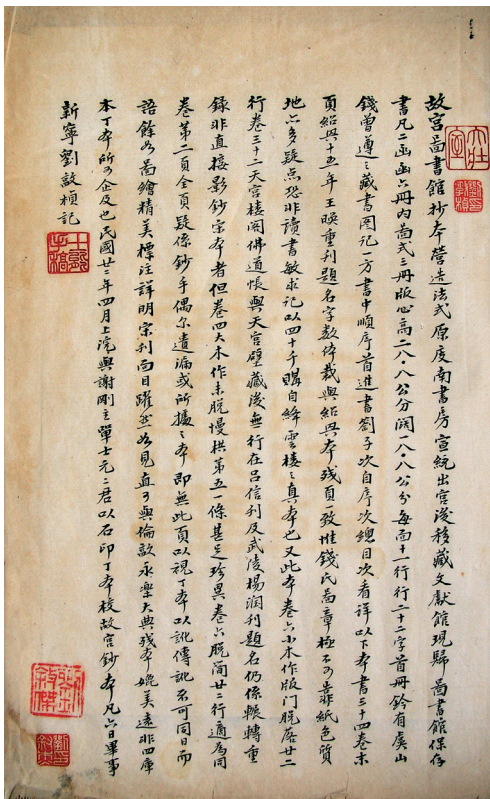


图3: 刘敦桢《故宫钞本〈营造法式〉校勘记》

将此《记》稍作补充之介绍，并略述相关史实，以资学者参考。

又朱桂辛先生^⑩于《法式》一书之发现与重刊，系开启中国建筑研究一大机缘，借其名与实而肇建之营造学社也因此机缘发轫^⑪、开创了我国学术史上不朽的名山事业，今年是螭公诞辰 150 周年，亦呈此小文谨表纪念。

《记》写于薄宣纸上，页面宽约13cm、高约26cm，“版心”宽、高则各约为10cm、23cm。《记》文共9行，行约30字，该页曾经水浸，左下角残缺，他部稍有损；但末行“刘敦桢”署名则完整无缺，通篇文字亦刘公书风无疑，考其文意，亦可征于学社史事。

兹先录其《记》文字^⑫：(引号及断句皆依原文之标记，录为通用标点符号。文中残缺字样，“”系据文字残形依文意补全，“”系全字不存而仅依文意补全，“□”系未能遽断者仍付阙如。“┘”为原文换行处。)

文津阁本页十六行，行二十一字，版心高21cm、宽15cm。每卷首三行，第一

行“书”“钦定四库全书”，第二行书“营造法式卷〇^⑬”，第三行书“宋李诫撰”。
 全书分订七册，总目删而不载，看详一章，列为附录、置于卷末，此二项乃最大异点也。其誊录校对人员，详识每册前后，计总校官候补知府叶佩荪，校对官中书毛上臬，誊录监生刘理之，详校官编修程嘉谟，覆勘纪昀，后三者用黄签标贴每册首页，余附记册末。书中除遗漏图样五页，卷三十六大宋^⑭作瓦作料例四页误掺入卷二十七泥作料例外，其余尚称精审。□□□□□□□^⑮殆因宣纸过厚，不便临摹，致失真象，不足深责也。
 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刘敦桢、谢国桢、覃士元、林炽田□……（文末余字数不详，最多8字）

《记》语凡 250 余字,所述除行格尺寸、校录官人等项属该书基本信息外,尚有三事值得注意。

一曰目录、看详。即《记》所云，“总目删而不载，看详一章，列为附录、置于卷末”者。按《法式》一书之“总目”与“看详”，江南诸抄本^{①6}皆存之而并列篇首，

是仍宋刊本^{①7}之旧也。惟四库本因编修自有格式，遂作如是删移^{①8}。然于此二项之议，则由来久矣。宋人于《法式》一书之记、录纷纷，即多言此二者，其中尤以绍兴十五年校勘、重刊所云“绍圣《营造法式》旧本，并目录、看详共一十四册”者，最为彰著（图4）。至有清一代，宋槧既佚，传本绝稀（图5），而卷数之议又起，亦颇涉此二者。^{①9}故刘公谓“此二项乃最大异点”，实颇有所谓也。

二曰遗漏、错页。此句《记》文虽稍缺，但依意不难补全，即：图样遗漏五页，文字则有五页错位^{②0}。虽然，刘公于此本之评价仍颇高，谓其“尚称精审”。按桂老倡勘《法式》之初，适逢文渊、文津、文溯三阁《四库》荟聚京师，遂有对校之便^{②1}。然《四库》诸本颇有异同，为清季学人所熟知，文津本则向有晚成而精校之誉^{②2}，故学社诸公多属意之，刘公此评赞实亦有所谓也。

三曰图样摹绘。既有故宫本“图绘精美、标注详明”^{②3}之珠玉在先，故于文津阁本之图样，刘公似未多之；图样页面抄录有刻工名一事^{②4}，（图6）亦未述及。惟于图样效果，则有“殆因宣纸过厚……不足深责也”之褒贬。由此推而言之，文津阁本《法式》之图样，虽因纸厚不便摹绘或失细节^{②5}，然以底本尚佳故其大处必有可观者也^{②6}。其中尤以数幅侧样图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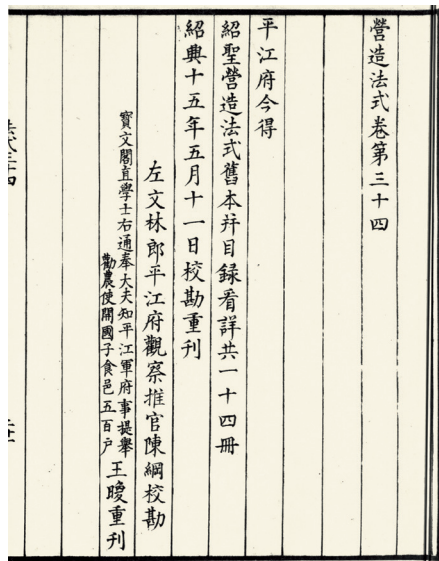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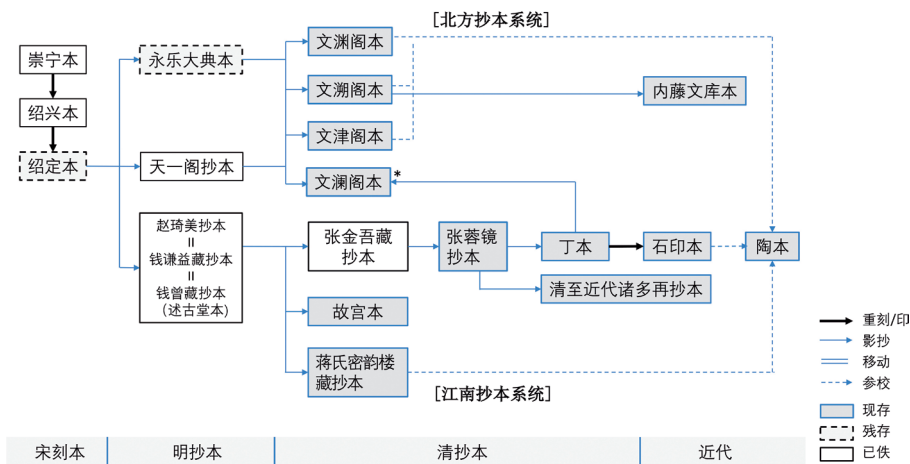
图4: 故宫本《营造法式》抄录的绍兴重刊题记

著，谢国桢文即明言之²⁷，近年傅熹年先生亦有专文详述²⁸，且可知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附图之有所取舍也²⁹（图7、图8）。

此《记》识于当年4月13日，与其事者则刘公并学社同仁谢国桢、单士元、林焯田共四人。此前数日，刘、谢、单三先生详校故宫本甫竣³⁰，《中国营造学社汇

刊》（后简称《汇刊》）第四卷第一期记此二事颇详，惟校者则概言四人云³¹。今读刘公二《记》，可确知矣。谢、单二先生，皆著名学者。校勘时，单为学社职员，任编纂之职³²，谢为学社社员，居校理之列。林焯田之名，则似仅见于该期《本社纪事》。考诸翌年学社职员梁启雄所撰文，知林乃梁近年助手之一，协其编纂《哲匠录》³³，当时应是以此身份参与刘、谢、单三人之校勘³⁴。

按此校勘事在四月，而该期《汇刊》之出版时间则书作三月，矛盾明显。封底英文页，却作七月（July）出版（图9）。可知该期本应于三月出版，实延至七月，中文页则用成版未改，故有抵牾。出版愆期“三月有余”，本期《纪事》亦已自作申说³⁵。此后至明年九月，各期《汇刊》，



*注：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清末战火中多有损毁，现存阁本《营造法式》抄自丁本。

图5：《法式》版本、抄本流传关系略图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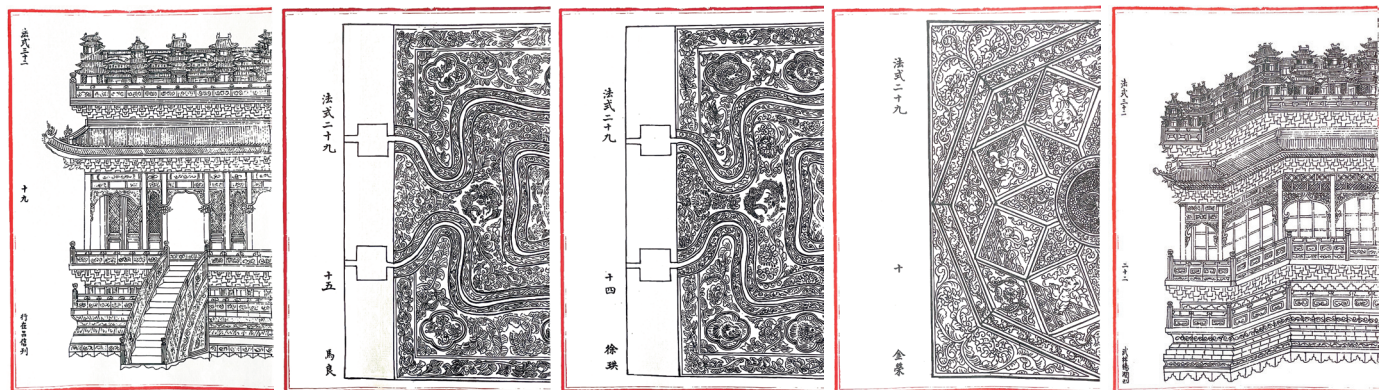


图6：文津阁本抄录刻工名（页左下角）诸页面：“行在吕信刊”“马良”“徐珙”“金荣”“武林杨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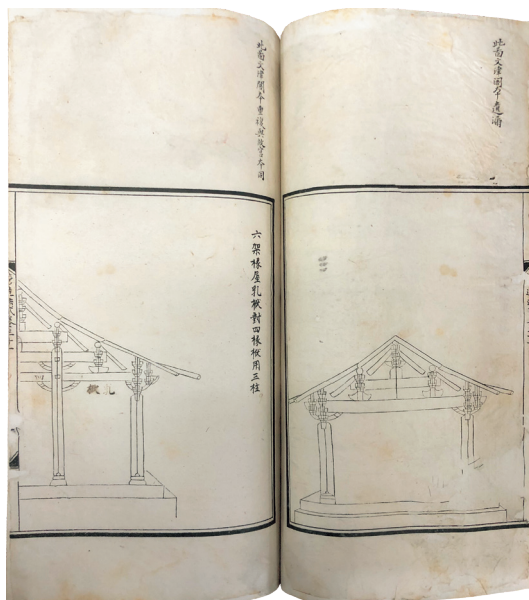


图7：中国营造学社订稿本《法式》，刘敦桢手书校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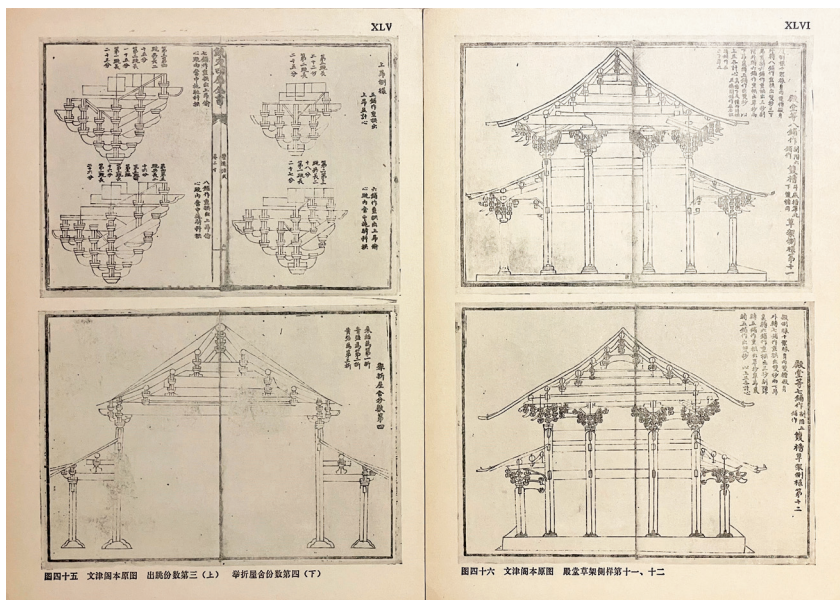


图8：《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图版所附文津阁本《法式》图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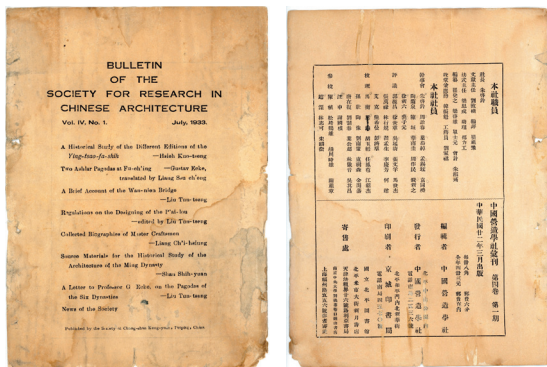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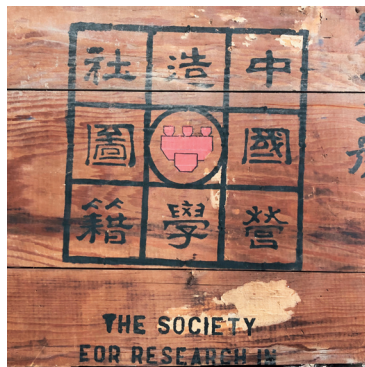


图9:《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封底、封三



图10:“中国营造学社图籍”木箱(修复前),外观及局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



出版时间之参差皆如此^⑤。本年岁首,榆关失陷,华北危岌,是月梁思成先生考察正定所记途中纷乱种种,即是实录^⑥。故《汇刊》出版多有延宕,亦缘此时局之变也。

当时,陶兰泉^⑦应藏园先生^⑧之邀为故宫图书馆编订《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将付梓^⑨,方检得南书房原藏之影宋抄本《法式》,即所谓“故宫本”者,学社同仁“惊为奇迹”,详勘之役遂举^⑩。不旬月,校勘毕。所获最要者,或为诸抄本皆祖绍兴而非崇宁,页间刊工之名是其锁钥^⑪,谢国桢即言之颇详。刘公两题跋,是略述此十数日间以二本校勘之梗概也。又四年,梁、刘诸公南迁,桂老遂度藏图籍资料于津门以冀弗失,然未二载竟失之于洪水(图10)。桂老痛惜之余,尽收检裱护之,刘公此《记》则其中失而复得之一页也^⑫。今也去诸先贤之逝又数十载,后学获睹此《记》,如临驹轮巷陌,营造学社近百载浮沉宛在目前。至于《记》所言文津阁本《法式》之图与文,或有发覆可续貂于诸前辈高论者,则待另篇云。

(感谢多年来刘叙杰、殷力欣先生指示刘敦桢、陈明达先生关于《营造法式》研究的书迹、手稿。)

2020年纪念中国营造学社90周年的系列活动期间,曾作过多种形式的展示和介绍,其中的概述文章即参考文献[1]。石印本是《营造法式》一书最早的现代刊行本,是朱启铃在南京图书馆发现钱唐丁氏抄本《法式》后,1919年9月以此为底本石印七册,开本26cm×15cm,较原本略小。见朱启铃《序》,齐耀琳《石印〈营造法式〉序》,傅嘉年《南京图书馆藏钱唐丁氏旧藏本〈营造法式〉简介》。参见参考文献[2];参考文献[3]:814-819。第二年又依原式出版了石印大本共八册,开本33cm×22.5cm。参见参考文献[4]:16。

③ 刘敦桢任文献主任是从1932年夏天开始。1931年7月营造学社改组,“分为文献、法式两组”,梁思成受聘为法式主任,9月1日上任。参见参考文献[5]:183。文献组则先是阚铎为主任,阚氏10月辞职后由社长朱启铃兼任,旋即聘请刘敦桢担任。朱启铃在1932年3月15日写给中华文化基金会的申请补助经费函中提及,文献主任一职,当时正“拟聘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君兼领”。参见参考文献[6]:161。1932年7月,刘敦桢从中央大学建筑系辞职,移居北平。参见参考文献[7]:212。而6月出版的《汇刊》,已经在封三“本社职员”的“文献主任”之下写为刘敦桢的名字,可知此后刘敦桢即为营造学社文献主任。参见参考文献[6]。

④ “故宫本”指的是1933年3月陶湘在故宫图书馆发现的《营造法式》清抄本。因其行款格式与宋刊本残页相同,且内容完备、图样精美,被学界推为最善本。该本的发现和1933年的校勘,参见参考文献[8]:148-149;[9]:7,9-14;以及刘敦桢识语(后被整理成文:《故宫抄本〈营造法式〉校勘记》),见参考文献[10];对故宫本的专文介绍,见参考文献[11]。

⑤ 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后一直藏于承德避暑山庄,至宣统元年(1909年),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欲将阁内藏书调入京师,获准后始终未曾办理。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教育部继续办理此事,自1913年12月阁书开始运送进京,前后又经多方干预,最终在1916年京师图书馆完成了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接收工作。此后阁书未受战乱影响,现存国家图书馆。参见参考文献[12]。

⑥ 故宫本的校对工作在4月上旬完成。参见参考文献[10]。又依此《记》,文津阁本的校对在4月13日完成。用这两本校勘《法式》可能是学社因故宫本的刚刚发现而“临时”安排到4月前两周连续进行的一项工作。

⑦ 我们近年策划、组织“营造学社之道”展览时,为便于观摩学习,蒙刘叙杰先生慨允,也在展览中使用了

这篇《校勘记》的照片。参见参考文献[1]:77。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79年,出版时加上了《故宫抄本〈营造法式〉校勘记》的题名,后相继收录在《刘敦桢文集》及《刘敦桢全集》。原文则书写在刘敦桢自用《营造法式》石印本扉页上,书影首次发表在2007年,收录在《刘敦桢全集》第十卷,同书还收录了刘敦桢以故宫本校勘《法式》的详细记录。近年,傅嘉年先生又以影印本和点校本两种形式出版《法式》合校本,里面也包含了上述题记和校勘记录,是1960年代自刘敦桢手批“陶本”过录而来。另外,除原本外,至少还有两种已知的《法式》传本也过录有这次以故宫本校勘的记录:一是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陶本,应是过录自刘敦桢的陶本;一是陈明达《法式》抄本,是以石印本为底本,将全书用毛笔手抄、绘而成,应是抄于1930年代陈明达加入营造学社之初。

⑧ 关于营造学社图书资料等在1937年以后的保管、转移,尤其是1939年天津洪水后的情况,有多种档案资料及回忆追述文章等提及:①刘敦桢1962年为童寓《江南园林志》所作的序就提到了学社南迁后,寄存天津银行的图书资料“悉没洪流中”,以及朱启铃“收拾丛残”的事情。参见参考文献[13]。同样是来自刘敦桢的记载,是刘叙杰、郭湖生先生1980年代整理公布的刘敦桢在这段时间的西南调查日记,有在调查途中的刘敦桢、梁思成与留守昆明的林徽因联系朱启铃及天津银行在洪水之后提取、修复这些图籍的记载,是当时实录。参见参考文献[14]:226-319。②这些文献中,以朱启铃之子朱海北《中国营造学社简史》所述较为完整,其原始史料应是来自当事人朱启铃本人的书面或口头讲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乃先将重要图籍文物分别检束寄顿。旋经朱社长及梁刘两主任筹议结果,以贵重图籍仪器及历年工作成绩,运存天津麦加利银行……1939年夏,天津发生水灾,寄存麦加利银行地库之物品,全部遭水淹没,渍于水者凡二月。图籍仪器照片之类,大部损坏不堪。水退后运京整理,费时三月,所得不及原来十之二三,仪器多种,亦全毁坏……北京保管处所保管之图书、仪器、模型、稿件等,胜利后结束,社中资料分散存置各处。新中国成立后,略加整理,计存置于清华大学者为图稿、照片、瓦当、文物等。存置于文物整理委员会者为书籍。存置于都市计划委员会者为铜版、铅版、出版物及家具等。存置于历史博物馆者为墨线图及彩色图……学社现有之资料(甲)书籍由文物整理委员会代为保管。(乙)图稿照片瓦当文物由清华大学营造系代为保管。(丙)铜版铅版出

注释

① 这篇文字在原书迹的页面上并无题名,这里依刘叙杰先生此前整理刊布《故宫抄本〈营造法式〉校勘记》的先例,暂拟作此题。

② 该本现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我们在2019—

版刊物及家具由都市计划委员会代为保管。(丁)墨线图及彩色图暂由历史博物馆陈列。”参见参考文献[15]: 11-14.按其文虽发表于1999年“纪念营造学社70周年”之际,但考其史料,可知底稿则应写成于1952年春夏间。③梁再冰1980年代回忆1940年代在李庄时听说的情况:“后来,又传来了天津涨大水的消息。营造学社的一批无法带到后方的图片资料当时寄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中,涨水后全部被淹毁,这是父母和学社成员多年心血的积累,所以父亲和母亲闻讯后几乎痛哭失声。”参见参考文献[16]: 242。④当时也在李庄的刘致平后来回忆道:“留在北京的营造学社财产与资料,由朱启铃先生费尽心血加以保存。大批资料图纸,存放在天津某银行地下库中,不幸1939年天津水灾时,被水浸泡,许多珍贵的图纸资料受损,这是非常可惜的。”参见参考文献[17]: 2。⑤林洙1995年的著作因综合了各方了解的情况,因此对此事始末叙述十分详细,如关于资料的保存:决定存入天津英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中,并规定必须有朱启铃、梁思成、刘敦桢三人的联合签名才能提取;关于朱启铃组织抢救水浸资料,“朱与原学社职员乔家铎、纪玉堂等人一起将这批图纸胶片逐张摊开晾干,作为原始资料留存……”参见参考文献[18]: 16-17, 95, 110-111。⑥费慰梅的著作也提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但该书所述与其他的文献略有差别。参见参考文献[19]: 124, 181。

⑨关于1946年以后的情况,除了前述资料外,当时在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文整会)工作的杜仙洲后来也有回忆:“讨论结果,照相仪器、绘图仪器、照片等归清华。家具归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图书资料归文整会。当时大家戏称‘三家分晋’。”参见参考文献[20]: 306-307。21世纪来,藏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这部分图籍资料陆续刊布了一些,如分别收入《梁思成全集》《刘敦桢全集》的一批佛塔专题调查报告。这部分的情况得到了殷力欣、永昕群先生的指教。

⑩朱启铃1929年3月24日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写道:“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途辙。年来东西学者,向北相望,发皇国粹,斐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沉胥,传述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而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聚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参见参考文献[21]: 1。

⑪朱启铃(1872—1964),字桂辛,晚号蠖公,创办中国营造学社,任社长,延聘梁思成、刘敦桢入社开展研究。

⑫高夕果的文章(参考文献[1])已经识录过该《记》的文字,我们又进一步识读出一些文字,并结合其文意可以补释出一些文字。

⑬原文如此,意为“卷次若干”。

⑭详细核对文津阁本《法式》的卷二十七前后的实际内容,可知是卷二十六的大木作、竹作、瓦作料例误掺入卷二十七中,于是据此补充缺失的几个字。

⑮由上下文的意思,并结合谢国桢文章可推知,这句话说的是图样细节的缺憾。

⑯江南诸抄本中有代表性的几种,可参看傅熹年先生的介绍(参考文献[3])。

⑰现存“宋刊本”残卷有:卷八首叶前半,此叶是傅增湘于1920年前后在清内阁大库中捡得卷十之第六七、

九、十叶,卷十一至十三卷,此部分在1956年发现于国家图书馆中,后经学者分析,判断该残卷为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年)重刻,后代修补。

⑱虽然都是删移,四库诸本也不完全相同。从一个表现可以略窥一斑:三种《四库》的《法式》一书,《提要》就各不相同。

⑲因为《法式》现存各种抄本的目录和内容都是“制度”部分有13卷,不同于“看详”所说的15卷,再加上宋刊全本已经看不到了,故而,早在乾隆时代,四库馆臣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本书内容不缺,只是后来传抄过程中对卷数做了合并,所以少了两卷。清代以来,众说纷纭,也有看法认为就是存本不全了,但一般还是倾向于认为传本《法式》就是全本,如陈仲篚1962年的文章就是这样。参见参考文献[4]: 13—14。近年王其亨教授利用陈明达先生工作用“小陶本”对四库馆臣说法进行了核实,确认篇目不缺。参见参考文献[22]。傅熹年合校本《法式》又引用《续谈助》证明北宋刊本“看详”写的应该是13卷,卷数之议遂定。参见参考文献[3]: 838。在此以前,存在这两卷之差的疑问时,目录和看详是否计入卷数,就成了辨析的一个问题。

⑳实际掺入页数,以文津阁本计,是6页;以石印本计,是5页有余。

㉑名义上仿宋刊本(陶本)以四库三本校勘而成,如主事者陶湘1925年在该本的《识语》里说的——“以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参见参考文献[25]: 253。但其中颇有疑点,学界早就有议论。例如,“五口慢棋”一条是初印陶本最为人们熟知的缺漏,但这条在三种四库本里并没有缺失。至于陶本中的很多图样,我们近年的研究发现,是和文溯阁本关系密切,和另两本却很不一样。加上学社同仁都一再明确提到陶本刊行前互校使用的是文溯阁本,而没有提及另外两本,因此很可能当时使用的只是(或主要是)文溯阁本。参见参考文献[8]: 149, [9]: 10, [26]: 5, [27]: 9。另外,陶湘署名发表的《营造法式校勘记》系以陶本和文溯阁本相校亦可参看。参见参考文献[28]。(此承王其亨、成丽老师赐教。)

㉒朱启铃1935年回顾民国初年的影印《四库全书》计划时就提到,当时之所以拟采用文津阁本,除了因其在宫外“便于取携”之外,也有传闻“仁宗幸避暑山庄颇有补订”的原因。他还提到,文渊阁《四库》因有陈垣先生的扎实研究,已经知道有若干缺失,文溯阁《四库》则在乾隆朝刚修完时就发现很多错误。(其中有些看法似乎和先前几年《汇刊》的评论有些不同,详究仍待专论。)参见参考文献[29]: 314, [30]: 12-17。我们近年持续研究《法式》诸本,也关注了现存三种四库本的异同。大体上可以看出:文溯阁本《法式》对文字部分校勘精良、错误较少,实为一前“现代”整理本,不过,此本的图样有整理“过度”的嫌疑,而且图案绘制不免清代风格;与文渊阁本相比,文溯阁本的特点,结合其再抄本和图样照片看来,校勘不及前者精审,同时保留底本原样也更“忠实”,但图样进行了明显重绘;文津阁本的情况大体介于两者之间,但与文溯阁本似乎更近,是较为接近底本的非“整理本”,尤其是图样部分保留了不少刻工名字,十分珍贵。三本各有特点,在研究时很可以互相补充。这部分和前文关于几种四库本的认识成果,主要体现在2010年以来笔者(丁垚)先后指导任思捷、杨朝(参考文献[31])等同学的几种天津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论文,曾在一些学术会议

发表、交流。得到了晋鸿逵、范景中、陈先行、孙田等师友的赐教和帮助,谨致谢悃。

㉓刘敦桢在以此文津阁本校勘之前几天,总结刚刚以故宫本校勘的收获,关于图样就写道:“余如图绘精美,标注说明,宋刊面目,跃然如见。”参见参考文献[10]。

㉔见谢国桢在这次校勘后所作的《〈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一文,提到在文津阁本《法式》里发现了南宋刻工的名字,这是他判断后来的传本都是刊于南宋而不是北宋刊本的关键。参见参考文献[9]: 5。刘敦桢在这篇《记》里对刻工的问题并未多说,想必也是缘于谢国桢将有专文论述。至于总结本月校勘工作的这篇专文因何由谢国桢操刀,或许还是由于上月陶湘发现故宫本事出偶然,而学社“职员”刘敦桢、单士元、梁启雄等人都有既定的工作计划(如《营造算例》、明清建筑史料汇编、《哲匠录》等编纂研究),所以总结撰写校勘记这一“临时任务”就由并非职员的社员谢国桢来完成了。而且就学养来说,他曾亲炙王国维、梁启超等关于版本目录之学的传授,也是合适的人选,这也可能是刘+谢+单(+林)这一组合构架的初衷吧。关于该本所保留的刻工名字,更详细的介绍,见参考文献[3]: 820-822。

㉕谢国桢稍后也提到“其书(文津阁本)为厚宣纸抄本,细部已失其本来面目矣。”这显然和刘敦桢《记》中所说的是相同的意思。见参考文献[9]: 13。

㉖据《四库提要》可知,编纂《四库全书》时,校、抄《营造法式》所用的底本是范氏藏“天一阁本”,应是宋刊本的抄本。因该本缺少卷三十一,所以该卷是用“永乐大典本”这一部分为底本补入的。参见参考文献[22]。综合学界对《四库》的研究,以及前述对三种四库本《法式》的认识,可知“天一阁本+永乐大典”这一底本还是很接近宋刊本面貌的。

㉗谢国桢稍后综合营造学社已有研究时亦提及:“丁本大木作制度,据梁思成先生研究,间架构造,误者不少……文津阁四库本图,似较丁本为胜,大木作间架亦不误。”参见参考文献[9]: 13。

㉘如卷三十一的图5、13、19、20共四幅图,傅熹年先生强调指出,“张本”“丁本”及陶本都错在柱位移动,而文津阁本不误,与故宫本全同。见傅熹年《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简介》,参见参考文献[3]: 820-824。

㉙陈明达的名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图版部分,收入文津阁本《法式》的图样共10页,绝大部分是殿堂、厅堂的侧样图。而未采用有明显错误的丁本或陶本的图样。参见参考文献[32]: XLV-XLIX。见注释[25]引谢国桢文。

㉚刘敦桢故宫本《校勘记》写的是四月上旬:“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四月上浣,与谢刚主、单士元二君,以石印本校故宫钞本,凡六日毕事。”参见参考文献[10]。

㉛《本社纪事》记四人校勘两书是笼统说的,未做分别:“以上二书,经刘敦桢、谢国桢、单士元、林圻田详校二遍,于丁本、陶本文字,厘正多处。”参见参考文献[8]: 149。

㉜大约在本年末,单士元也名列于“社员”之“校理”中。参见参考文献[33]。

㉝林圻田和范彦回二人这两年在协助梁启雄编纂《哲匠录》,这是梁启雄在1933年冬为《廿四史传目引得》所作的《序》中提到的:“余夙尝从事于编纂《哲匠录》,所搜取之资料,类皆不辨何世何代之古人断片事迹,至

其人之爵里事业，非进而加以考索，则无由得以详察！林炽田、范彦回二君襄余编纂有年，二君深感考索钩稽之烦劳，乃建议利用课余时间，编《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一书……”参见参考文献[34]：1-2。《哲匠录》是朱启铃很看重的一项工作，后来主要由梁启雄负责编纂，在《汇刊》上从1931年3月开始陆续发表，直到1933年12月。

③④中国营造学社1936年修正预算草案列出的“职员薪俸”项，有林炽田的名字，为“书记四人”之一，可知直到这一年林仍在学社任职。见朱启铃1936年7月与叶恭綽函附《致中英庚款董事会函稿》，参见参考文献[35]：230-235。

③⑤见《汇刊》第四卷第一期《本社纪事》：（三）汇刊出版愆期。参见参考文献[8]：149。关于该期的成书出版，笔者将另有专文述及。

③⑥从《汇刊》第四卷第一期一直持续到1934年9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③⑦参见参考文献[36]。

③⑧陶湘（1871—1940），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著名学者、藏书家。

③⑨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后改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等。著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④⑩《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参考文献[37]）是陶湘为故宫图书馆编订的殿本书目。始于1926年受时任馆长傅增湘之邀，毕工于1933年5月后。当时宫内各处如文渊阁、三殿、六宫、御园、书房等处珍藏书籍成聚寿安宫图书馆，陶湘数年间往返京津完成此稿。傅增湘在为该书所作《故宫殿本书库目录题辞》亦颇言及陶湘发现旧抄《营造法式》一事，亦见于参考文献[38]：1080-1084。

④⑪参见参考文献[8]：149；[9]：7，9-14。

④⑫后来学者进一步详考刻工的时代，知道这些后世抄本都是直接或间接源自绍定间刊本。参见参考文献[3]、[4]，亦参注释[20]。

④⑬参见注释8、9。

参考文献

- [1] 高夕果，钱高洁. 中国营造学社藏书手书题记探析[J]. 建筑学报，2019，（12）：73-78.
- [2] （宋）李诫编修. “石印本”《营造法式》[M].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
- [3] （宋）李诫编修，傅熹年校注. 合校本《营造法式》[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4] 陈仲箴.《营造法式》初探[J]. 文物，1962，（02）：12-17.

[5] 本社纪事[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83-190.

[6] 本社纪事[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2）：161-167.

[7] 刘敦桢. 刘敦桢先生生平纪事年表. 刘敦桢全集第十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8] 本社纪事[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1）：148-149.

[9] 谢国桢.《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1）：1-14.

[10] 刘敦桢. 故宫抄本《营造法式》校勘记. 刘敦桢文集第一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260.

[11] 傅熹年. 介绍故宫博物院藏抄本《营造法式》，（宋）李诫编修，故宫博物院编.《营造法式》（“故宫本”）[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12] 坤顺. 文津阁《四库全书》抵京始末[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3，（02）：26.

[13] 刘敦桢. 序. 童鸞. 江南园林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14] 刘敦桢. 川康古建调查日记1939年8月26日～1940年2月16日. 刘敦桢文集第三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226-319.

[15] 朱海北. 中国营造学社简史[J]. 古建园林技术，1999，（04）：10-14.

[16] 梁再冰. 回忆我的父亲梁思成[C]. 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编印，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227-249.

[17] 刘致平. 纪念朱启铃、梁思成、刘敦桢三位先师——有感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之发掘、深入研究、继承、发扬和不断创新[J]. 华中建筑，1992，（01）：1-3.

[18] 林洙. 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19] （美）费慰梅著，曲莹璞等译. 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20] 中国文物研究所编. 中国文物研究所七十年[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1] 朱启铃. 中国营造学社缘起[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1-6.

[22] 王其亨，成丽. 传世宋《营造法式》是否完本？——《营造法式》卷、篇、条目考辨[J]. 建筑师，2009（03）：106-115.

[23] （宋）李诫编修.《营造法式》（文津阁《四库全书》）[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24] （宋）李诫编修，故宫博物院编.《营造法式》（“故

宫本”）[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25] （宋）李诫编修，陶湘等校.《营造法式》（“陶本”）[M]. 上海：商务印刷馆，1933.

[26] 英叶慈博士以永乐大典本营造法式花草图式与仿宋重刊本互校之评论[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2）：1-6.

[27]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序. 梁思成全集第七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8] 陶湘. 营造法式校勘记[J]. 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1934：1-14.

[29] 朱启铃. 文渊阁藏书全景后记[J]. 国学季刊十卷二期，1936：311-316.

[30] 陈垣著，陈智超编. 陈垣四库学论著[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1] 杨朝. 内藤文库本《营造法式》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2020.

[32] 陈明达. 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33] 本社职员·本社社员[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4，4（3-4）.

[34] 梁启雄编. 廿四史传目引得[M]. 上海：中华书局，1937.

[35]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 历史文献·第10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6] 梁思成. 正定调查纪略[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4，4（3-4）：1-41.

[37] 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M]. 北京：故宫博物院，1933.

[38] 傅增湘.《故宫殿本书库目录题辞》. 傅增湘撰，傅熹年整理. 藏园群书题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图片来源

图1/图2/图8/图11：丁垚拍摄，《法式》和木箱现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1及图2曾展于中国营造学社90周年纪念展览“营造学社之道”，2019年12月图3：刘叙杰先生提供

图4：参考文献[24]卷三十四页二十一

图5：杨朝绘

图7：参考文献[23]卷二十七页五、页六、卷二十九页十、页十四、页十五，卷三十二页十九、页二十二

图9：参考文献[32]：XLV，XLVI

图10：殷力欣先生提供